



拉美黄皮书®

YELLOW BOOK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权威机构 · 品牌图书 · 每年新版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发展报告 (2010~2011)

ANNUAL REPORT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0-20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1
版



拉美黄皮书

YELLOW BOOK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2010~20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主 编 / 吴白乙

副主编 / 刘维广 蔡同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2010~2011/吴白乙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4
(拉美黄皮书)
ISBN 978-7-5097-2257-2

I. ①拉… II. ①吴…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报告—拉丁美洲—2010~2011②社会发展—研究报告—西印度群岛—2010~2011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拉丁美洲—2010~2011④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报告—西印度群岛—2010~2011
IV. ①D773.069②D775.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042 号

拉美黄皮书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2010~2011)

主 编 / 吴白乙
副 主 编 / 刘维广 蔡同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李 博 段其刚
责任校对 / 李艳涛
责任印制 / 董 然
品牌推广 / 蔡继辉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6.5 字数 / 455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257-2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声明

“皮书系列”（含蓝皮书、绿皮书、黄皮书）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按年份出版的品牌图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拥有该系列图书的专有出版权和网络传播权，其 LOGO () 与“经济蓝皮书”、“社会蓝皮书”等皮书名称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登记注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法拥有其商标专用权，任何复制、模仿或以其他方式侵害 () 和“经济蓝皮书”、“社会蓝皮书”等皮书名称商标专有权及其外观设计的行为均属于侵权行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采取法律手段追究其法律责任，维护合法权益。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侵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上述权利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电话：010-5936712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拉美黄皮书编委会

主任委员 吴白乙

副主任委员 吴国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纪新 刘维广 苏振兴 宋晓平

张 凡 郑秉文 贺双荣 柴 瑜

袁东振 蔡同昌

主要编撰者简介

吴白乙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顾问、理事等。

长期研究国际战略问题、危机管理、中国外交，曾主编《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20世纪回顾丛书》（6卷本）并著有《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再思考》、《公共外交：中国外交变革的重要一环》、《中国经济外交：与外部接轨的持续转变》、《中国在朝鲜半岛：利益与作用》、《中国对“炸馆事件”的危机管理》、《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中国的安全观念及其历史演变》等一批被广泛引用和转载的学术论文。

刘维广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古巴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拉美政治、拉美国际关系和古巴研究。

主要成果：《新世纪以来的中古关系》（合）、《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关于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国际评价》、《切·格瓦拉及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墨西哥国家行动党的渐进式改革以及党政关系的非传统模式》等。

蔡同昌 1980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西俄系俄语专业。1980~1984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东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主任。

主要编著有：《阿根廷危机反思》、《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国际新格局下的拉美研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7~200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8~200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9~2010）》、《发展中国家的 development 问题》等。

导 论

吴白乙*

2010 年是拉美独立运动 200 周年。

19 世纪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扩展的世纪。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世界各地带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制度和人文思想，推动了民族主义潮流的兴起，从而揭开了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乃至现代化的序幕。

1804 年，海地经过大规模黑奴起义，终于成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1810 年起，南美大陆各殖民地人民相继开始起义，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最终结束了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列强长达 3 个世纪的统治，建立了一批新兴共和制国家（除巴西之外）。

独立后的拉美地区，经济上摆脱了宗主国的控制和盘剥而获得极大的进步。1870 ~ 1950 年，拉美地区年均 GDP 和人均 GDP 增长率一直高于英、法、德等西欧大国；1962 年，阿根廷人均 GDP 已达 1145 美元，仅略低于英国（1512 美元）和法国（1590 美元），却高于意大利（990 美元）、日本（634 美元），并且将拉美地区前宗主国西班牙（519 美元）和葡萄牙（407 美元）远远甩在后面。

然而，拉美各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却未能继续快速前行。20 世纪中期以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世界 GDP 总量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 7.8% 左右，50 多年间几无增加。2010 年 8 月，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对全球 213 个经济体作出划分：海地，这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独立最早的国家仍属于“低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 28 个，其中在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有 9 个，占 32%，而在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则多达 19 个，占 68%。

长期以来，人们注意到这些国家在同一收入水平徘徊而不能向上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故将这一现象视作经济学理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典型。不少欧美、

*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拉美学者在比较研究中发现它与拉美经济在同期全球 GDP 中所占的“固定”比重相吻合，因而认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与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关联度不高，失去了持续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机遇。有的学者采用国家创新价值、有效劳动和高效劳动、有效投资和优质投资、先进技术研发、人均资本和人均技能等复合现代化指标来检验和解释拉美经济向信息化、知识与生态文明转型不足，因而难以冲出“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一些人试图从更深远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基础乃至制度成因，认为拉美的现代性与欧美的现代性“貌合神离”。宗主国的封建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充分发育，早年的革命运动未能为现代化提供成熟的制度准备。尽管独立后本应解放当地的生产力，催生现代化，但“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地区的经济权力结构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社会权贵仍保持着自身利益的机能”，使得拉美最初的现代化“只是一层虚饰，为顽固的机制加上装饰性的点缀，同时却不去实现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改革”。旧的体制将现代器物文明植入拉美之后，改善了中上层阶级的面貌和命运，却没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惠及全社会，“大众的贫困和持续的冲突”成为现代化留给拉美的负面遗产之一。拉美各国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一再导致改革反复曲折，经济增长不稳，社会发展陷于困顿，被外人称之为一段“发展的劫掠”的历史。

那么，拉美的未来是否无法从制度选择的困境中走出来？2010 年 1 月，智利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签署协议，正式成为该组织第 31 个成员；11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智利人均 GDP 将于 2012 年超过 1.2 万美元。这些都意味着智利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滞留长达 41 年后将率先进入“富国俱乐部”。本年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以此为主题，对智利近 20 年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平稳转型进行“全景式”的回顾和分析，不仅借以纪念拉美独立 200 年这一划时代事件，更主要的是探究智利个案所可能包含的某种普遍的区域现代化意义。

在拉美多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威权”与“民粹”或为两大思潮相对而立，或为两种制度形式相促而生，不断地引导满怀改革期望的人们由此到彼，交替追捧，摇摆往复，既创造过短暂的振兴和繁荣，也留下了长期的政治失范、经济失衡和社会失稳。以智利为例，在 1961～1973 年民主体制下，政府并没有采取开明的、适宜的市场经济政策，尤其是阿连德执政时期更将民粹主义推向了极致，



国家控制企业多达 400 多个，占全国工业产出的 80%，占全国 GNP 的 60%，公共卫生、住房、社会保障和家庭补贴等福利性投入连年大幅提高，生产、工资、价格关系逐渐扭曲，生活成本和通胀率快速攀高，货币贬值达 300%，经济濒临崩溃。1973 年，智利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主张社会主义国有化运动的阿连德政府，此后 17 年中军政府强力推进对国家经济结构的“再私有化”，恢复市场机制和提高经济自由度，从而使国家经济重新企稳回升，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为后来的“还政于民”奠定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基础。

在本书特别报告的作者看来，第一，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威权制度可能提供经济结构“向好”改革的机会，且政治专制与经济增长也可以长期共存。“在发展中国家里，只有在经济上实行开明统治而不放弃专制道路的国家才是赢家。”

第二，需特别注意改革的次序，不可片面追求民主政治目标。稳定大局之下的系统性市场经济改革应是一国最终走向良性发展之路的优先目标，而民主政治必须依赖社会充分发育方可实现对“已经构建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有效保护，否则不仅会对已有的改革成果起到“促退”作用，甚至还可能保护“坏”的制度。

第三，实行各派别之间的联合执政，避免单一派别在政策上“矫枉过正”。还政于民后历届政府较好地继承了军政府统治时期确定的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深化和拓展不同领域的改革，有效地防止在制度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大折腾，没有发生拉美其他国家体制转型中常见的“钟摆现象”，使智利经济、社会在总体上保持了稳定、持续的增长与发展。

第四，构建宽容、和解的社会文化，二次民主转型经受住社会分裂的考验。历届民选政府较好地贯彻了“原谅与忘却”原则，运用“追溯正义”、“修复正义”和“应报正义”等策略，缓和了各派别、阶层间的对立情绪，为民主政治改革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并最终通过不断修宪，加强法制，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对公民权利、人身自由的保护力度以及反腐败斗争的业绩。

第五，连续一致的制度变迁使智利既定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臻于成熟，其经济、社会的可治理性愈加显现出稳固、有序、高效、优质等特色，可以为身处同类挑战和困境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版本”。当然，这种长着“智利面孔”的制度选择是基于其自身的历史传统、文化观念、民族习



俗、纪律意识、合作精神等多方面特性的，因此其不足和局限也同样是明显的。

与特别报告相关，2010~2011 年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专题篇聚焦南美地区四个重要国家的选举事件。经过两轮投票，2010 年 1 月代表中右翼联盟候选人的塞巴斯蒂安·皮涅拉赢得智利总统大选，结束了中左政治力量连续 20 年执政的纪录，也是 52 年来首位通过投票当选的右翼党派总统。皮涅拉的胜利进一步印证了特别报告所指出的智利民主政治的成熟度：由于智利政坛就基本的治国理念和政策思想存在着广泛的共识，直接决定大选结果的因素已不是对立的“主义”，而是不同阵营处境、条件及其策略选择，特别是候选人的个人特质。皮涅拉是智利家喻户晓的大企业家，其资产超过 14 亿美元。在此次大选中，皮涅拉以全新的温和右派形象出现，提出一系列诱人的竞选承诺，如在未来 4 年内为智利创造 100 万个就业机会，争取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6%，还宣称实行税制改革，降低中小企业税赋，在 2014 年前新增 50 万脱贫人口以及扩大学校、医院和诊所数量等。

哥伦比亚先后于 2010 年初和年中举行了议会及总统选举。与 2006 年大选相比，哥伦比亚政治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右翼政治力量继续增强、左翼政治力量有所削弱、绿党作为独立的第三种力量异军突起。执政的民族团结社会党候选人桑托斯当选新总统，其胜利主要得益于前任总统乌里韦的政治遗产、竞选策略的不断调整、政党联盟以及绿党总统候选人莫克库斯的失误。桑托斯政府将继续巩固乌里韦总统的民主安全政策。但由于工作重心变化、亟待解决长期内战导致的各种政治及社会问题以及乌里韦总统执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偏差，桑托斯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将会发生很大幅度的调整。

在委内瑞拉，以查韦斯为代表的“魅力领袖”政治则遭遇到执政 12 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挑战。2010 年 9 月，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国会）选举，执政党未能在选举中赢得 2/3 多数议席。反对党联盟在国会获得立足点，使国会的政党构成向着多元化转变，从而获得制约查韦斯政府的关键手段。委内瑞拉已经形成执政党和反对党同盟对垒的政党格局，2012 年的总统选举变得更加难以预料。

2010 年 10 月，委内瑞拉的强邻巴西也在经过两轮投票后决出大选结果。凭借卢拉两届任期所创下的炫目“遗产”，劳工党候选人迪尔玛·罗塞夫获胜显得顺理成章，波澜不惊，同时还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在国会选举中，执政联盟进一步扩大了在众参两院的优势。然而在 26 个州长和巴西利亚联邦区行



政长官的地方选举中,执政联盟获得 16 个,反对党联盟获得 11 个。巴西社会民主党获得 8 个席位,成为获得职位数最多的党派。在“后危机时代”和“后卢拉时代”,罗塞夫的内政外交政策势必将与前任保持较强的延续性,同时也可能有所调整。新政府能否有效应对历史积累下来的发展难题、巧妙处置内外政治新变数,均将影响巴西下一步的行进轨迹。

总体而言,2010 年拉美国家政治发展基本稳定而有序,仅有少数国家如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出现了短暂紧张甚至动荡的局面;左翼力量执政势头未减,但反对派力量有所发展;公众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传统弱势群体参政趋势加强,突出表现为一批女性政治家当选部分国家领导人。

2010 年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在上一年第四季度开始复苏的基础上,逐渐加强了复苏的势头。多数国家采取的反危机经济政策的效果日益显现出来,并受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有利影响,2010 年前三季度整个地区经济增长呈逐渐加速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整个地区经济强劲反弹,各国间经济增长的差异继续扩大。巴西经济创下了近 30 年来的最高增长纪录,其在整个地区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进一步加大,并对整个地区经济复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美地区半数国家进入整个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增长前列,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复苏进程仍然相对滞后。

二是对外贸易全面增长,进口增长高于出口,商品和服务贸易盈余大幅度减少。

三是财政形势趋于好转,但其可持续性面临的压力有所增大。19 国初级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由上一年的 1.1% 下降到 0.6%,但仍未恢复到全球危机之前的财政基本平衡、略有盈余的局面。

四是通货膨胀有所加剧,经济出现过热迹象。全地区 33 个国家中,有 28 个国家的消费物价指数超过了上一年,有的国家甚至超过了两位数。

2011 年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其增速将会明显放缓。外部经济走向的不确定将成为左右拉美和加勒比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关国家政策调整势在必行,其难度和风险都将有所加大。

受经济恢复与增长的拉动,2010 年拉美各国的各项社会指标呈好转态势:贫困率和赤贫率持续下降到与 2008 年金融危机前持平或更低的水平;除个别国家,拉美地区总体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恢复和改善;经济增长带动劳动力市场发生



积极变化，就业率上升，但多数国家的实际工资出现下降。拉美国家的社会治理仍不容乐观，腐败问题积重难返，多数国家清廉指数水平较低，反腐机制亟待进一步加强。2010年，公共安全成为拉美社会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继续呈高发态势，两次强烈地震给海地和智利造成严重损失。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加速调整对拉美国家的对外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有所下降，援助减少，合作水平回落。与此同时，美国在拉美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政策力度则明显加强。为了应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拉美国家加强了团结与合作，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合作，其着力打造面向欧盟、俄罗斯、亚太、中东、非洲的对外关系多元格局的意向也日趋明显。

在众多国别报告中，应着重向读者推荐的是古巴、委内瑞拉和墨西哥3篇。2010年，古巴出现新的经济改革态势，其特点一是观念有所突破。政府逐渐放宽了对个体经营的政策限制，并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同时，还为新近批准的私营企业提供所需原材料和物资，准许银行向它们提供贷款，发展原材料批发市场。二是优化国有企业结构。古巴政府决定，到2011年3月底，古巴国营部门完成精简50万人的任务，3年内裁员100万，占全部国营部门职工的1/5。三是对原有体制作出系统的、稳健的调整与修正，将减少和取消补贴，逐步取消食品定额配给和货币双轨制，给农业以更大的自主权，减少对农产品进口的依赖，促进劳务和生物技术的出口等。古巴领导人一再声明改革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不断探索适合古巴发展“土生土长的”变革来提高发展效率，减少劳动冗员，确保社会公正。古巴共产党将于2011年4月召开“六大”，对更新古巴经济模式作出基本决定。

与古巴形成对照的是，2010年委内瑞拉政府继续坚持在国有化和中央计划性方向上大刀阔斧，一是将一批重要企业国有化；二是实行货币贬值50%，由刚实行不久的双轨制再退回单一固定汇率制，进行更为严格（包括企业在内）的换汇管制；三是宣布全国电力进入紧急状态，缩短商场营业时间和公共机构办公时间，并关停一些冶金厂、炼钢厂的生产线；四是积极吸引外国投资，进行了自199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油田开采权拍卖，来自印度、日本、西班牙、美国等国的能源企业将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组建合资企业。然而，



2010 年委内瑞拉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复苏最为滞后的国家之一，GDP 增长率为 -1.6%；资本与金融账户赤字为 155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依然为负增长，国际收支失衡加重；在国内经济紧缩的同时，存在严重的通胀压力；2010 年 1 ~ 10 月，失业率已升至 8.6%，高于 2009 年的 7.8%。

2010 年，墨西哥政治大事之一是举行地方选举，重新选出了 12 个州的州长、14 个州的议员及 1000 多名市长。这是自 2007 年选举制度改革以来首次在多个地区同时选举（以往为各地单独选举），也被看成是 2012 年 7 月总统选举之前三大主要政党之间一次重要的选战预演。由于墨西哥州在各州中选民人数最多，将于 2011 年 7 月举行的该州州长选举将成为 2012 年总统选举的一次民意测验。革命制度党人、现任墨西哥州州长恩里克·佩尼亚是下届总统选举最热门的政治家，对此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将再次建立有效联盟与之展开竞争。

2010 年墨西哥国内安全局势恶化是引起世人关注的另一大事件。卡尔德龙政府缉毒行动成绩斐然，使一批大毒枭相继落网，有组织犯罪受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这一政策遭到黑恶社会势力的强力抵抗，绑架、勒索、凶杀等暴力活动不断升级，严重干扰了国家政治体制建设进程、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在此情况下，墨西哥政府反毒战略面临挑战，公众对反毒斗争的效果及政府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能力仍心存疑虑，要求对此反思的呼声日益高涨。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年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试行新的编辑、审稿分工负责机制。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拉美学会会长、原主编苏振兴先生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具体指导，还参与了有关稿件的审读；副主编蔡同昌同志策划和组织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因病入院后仍尽责地审订了报告的统计资料 and 大事记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相关部门及本报告各篇作者亦倾力相助，为之顺利完成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和编辑也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在此，编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业务水平和知识局限，编者、作者在编写、审订本报告过程中难免有误，敬请识者原谅和指正。

Précis

The year of 2010 marks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Latin American & Caribb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 19th century was a century highlighted by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erever it went globally, challenged outdated productivity and brought forth capitalist production rules, market forces and humanistic ideologi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it also ushered in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LAC countries.

In 1804, Haiti became the first independent nation in Latin America after the slave revolt led by Toussaint L'Ouverture. From 1810 on, peoples of the various South American colonies began their respective revolutions in succession.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e Spanish or Portuguese colonial rules for three centuries in this subcontinent came to an end, leaving behind a cadre of newly-established republics (with the exception of Brazil).

After freeing themselves from the colonist control and usury, the post-independence LAC economie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gains. From 1870s to 1950s, the average GDP (annual or per capita) growth rate of the LAC region was consistently greater than Great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other Western Europe powers. In 1962, Argentina's GDP per capita reached 1145 U.S. dollars, only trailing Great Britain (1512 USD) and France (1590 USD) while significantly outpaced Italy (990 USD), Japan (634 USD) and former Latin America colonial powers Spain (519 USD) and Portugal (407 USD).

Howev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ere unable to continue advancing on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LAC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s total GDP stayed constant at 7.8% for over 50 years. In August 2010, the World Bank classified 213 economies around the globe according to 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per capita. Haiti, the frontrunner of the LAC independence movement, still remained a "low income" country. Of the "middle income" nations, the LAC region is home to 26 – 9 "lower middle income" nations (16.1%) and 17 "upper middle income" nations (35%).



For a long time, people began to take notice of these countries' tendency to hover around the same income level while unable to progress upwardly and view this phenomenon a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described in economic theories.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a number of European, Ame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scholars discovered a parallel between this concept and the LAC "fixed"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s total GDP in the same period, thus concluding that the region exhibited low correlation to the second wave of modernization and lost out on opportunities to continually boos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ts nations. Some scholars employed composite indicators of modernization, such as innovative index,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labor, effective and quality investment, advanced R & D, and per capita capital and skills to manifest the lack of information-based, knowledge-based and ecological-friendly transformations in the LAC economies. Such shortcomings account for the LAC difficulties in getting out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Others, who attempt to take a far-remote perspective by tracing the history and institutional origins, contend that the LAC modernity differentiates itself, more in substance than on surface, from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ones. The feudalistic forces had hindered a steady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LAC colonies. In consequence, the pro-independence revolts proved to be too premature to provide an adequate institutional groundwork for the follow-up modernizations. Despite embarking on the right track of modernization sooner or later, economic structures in the newly-independent nations remained intact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whereas aristocrats retained their inherited interest and power as before. 'Such modernity was only a veneer. It added a cosmetic touch to tenacious institutions while failing to effect the changes implied by the concept'. Along with the transplantation of material modernity, only the elites of the higher-middle class and above witnessed an evident improvement in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fortunes. For the average public, there was no drastic change in wealth and life-standards due to the delay of social reforms. General poverty, from then onwards, provoked repeated social-economic chaos and stagnated the LAC economies. Students of the LAC modernization label the history as 'a devastation of development'.

Having made such reviews, then people would be less confident in the LAC luck to avoid institutional dilemma. Can they no longer struggle in vain? In January 2010, Chil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 Development (OECD) to formally become its 31st member of "the club of wealthy nations". In Novembe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predicted that Chile's GDP per capita will surpass 12000 USD in 2012, making it the first in the LAC countries to jump

out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over the past 41 years. It is because of this notable development that the ILAS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Development Report” of 2010 –2011 selects Chile as its the keynote analysis, on the occasion to commemorate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LAC independence campaigns. With the Chilean showcase of a stable and comprehensive transition in the last 20 years, the authors tend to spell out its general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LAC region.

In many LAC countries’ path to modernization, authoritarianism and populism co-exist either as two poles of political philosophies, or as opposing institutional alternatives, which have led reformist advocacies swing back and forth and produced an unfortunate distortion—from short-term revivals to long-term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isorders. In Chile’s case, under the populist framework from 1961 to 1973, the government did not undertake effective and appropriate market economy policy. In particular, the period when Salvador Allende Gossens was in power pushed the populist ideologies to an extreme—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numbered over 400, registering 80% of the nation’s industrial output and 60% of its total GDP. Investment in welfares, such as public sanitation, housing, social security, family aid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year over year. The Chilean economy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ing as production, wage, price relations became increasingly skewed, cost of living and inflation skyrocketed and the currency depreciated roughly 300% . In 1973, the Chilean military coup overthrew the socialist, pro-nationalization government. In the subsequent 17 years, the military rule re-embarked on the privatization track, reviving market mechanism and economic freedom. Chile’s rapid growth in the mid –1980s laid a solid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 for its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civil society-building later on. In sum, the authors of the keynote report in this yellow-book contend for the major lessons that Chile obtained as follows—

-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uthoritarian rule may provide favorable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reform. Such a concurrence of political totalitarianism and robust economic growth could even become a long-term remedy of self-oriented governance, just as argued by the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 in September, 2003 that “among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only those will be the winners who are governed by economically enlightened governments that, at the same time, are governed in a strictly authoritarian way.”

- The order of the reform priorities matters after all. The Chilean case warrants political stability as a top conditionality for systemic economic reforms. Political democracy has to be secondary to societal cultivations stemming from the grown public



well-beings. Without these provisions as developed, populist politics would not just devastate the achieved reforms, but mislead the public to a ‘worse’ preference that protects inefficient institutions.

- In form of successive coalition governments, the Chilean partisan tradition shifts from denial to concession. No single incumbent force in the recent two decades was able to make an overcorrection of the previous policies, thus ensuring the reformist momentum set forth by the military rule. As a result, Chile has had a remarkable and sustained growth and avoided policy discontinuity.

- Thanks to the prevailing principle of “forgiving and forgetting” proclaimed by successive civil governments, a consolidated and tolerant society has grown up and lived through short-term political divisions in Chile. Under a relaxed circumstance, social and political tensions are alleviated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Rule of law comes into effect as the state intensifies efforts to protect civil rights,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o tackle down corruptions.

- Consecutive institution-building entails a well-framed and mature market economy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in Chile. As such systemic spillovers turn out in a steady order and high quality, the socio-economic governability also increases accordingly. The Chilean way of realizing good governance is worthwhile for the res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refer to albeit its limitations are inevitable.

Relevant to the keynote part, the yellow-book also provides a highlight report of electoral politics in 4 South American nations. It first covers the success by the right-wing candidate Sebastián Piñera who outweighed the rest rivals in January, 2010. While breaking the 20 –year record of incumbency by the leftists, he also sets a record as the first conservative politician in the past 52 years to become the Chilean president through public bailouts. His victory also underscores the nation’s maturity in democracy, as being pointed out by the theme report authors, that is based upon a cross-party and publicly-acknowledged consensus about nation-building. Landmarks of ideologies become vague and obscure. Therefore, the outcomes of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re finally decided by distinctive policy claims and personal charisma.

However, President 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 of Venezuela met the ever-serious challenge in the National Congress election in Fall, 2010. Although still maintaining a high popularity in his people as he did during the last 12 years, Chávez Frías might have come to know the limits of personal charisma—a united opposition force defeated his ruling party and became more legally capable to restrain the administration’s future executives. Things would go even worse in the forthcoming general election of 2012 if